

市场的逻辑与 中国的改革

The logic of market and
China's reform

李义平 /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市场的逻辑与 中国的改革

The logic of market and
China's reform

李义平 /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市场的逻辑与中国的改革 / 李义平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 6

ISBN 978 - 7 - 5141 - 5815 - 1

I . ①市… II . ①李… III . ①中国经济 - 经济
改革 - 研究 IV . ①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0504 号

责任编辑：王东萍

责任校对：郑淑艳

责任印制：李鹏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教材分社电话：010 - 88191344 发行部电话：010 - 88191522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bj3@esp.com.cn

天猫网店：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http://jjkxcbbs.tmall.com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10 × 1000 16 开 20.75 印张 280000 字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5815 - 1 定价：4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 881915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88191586

电子邮箱：dbts@esp.com.cn)

**世界在不断地变化，
对经济活动的思考永远不会停止！**

——李义平

自序 1

当代中国经济学的历史使命

脚踏在自己的土地上，为中国人民的福祉，为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而求索，为世界经济的发展贡献出与 13 亿人的大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经济理论，这就是中国经济学的当代使命。

一、为中国人民的富裕、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上下求索，不懈努力

经济学是实用的，一开始就把人民富裕、国家强大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国人称之为经世济民，带有管理国家、经济的意思。现代经济学一经诞生，就直逼国家富裕的主题。1615 年，法国重商主义的代表孟克列钦发表了《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只要实行多卖少买的重商主义政策，国家就可以富裕起来。英国重商主义的代表托马斯·孟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中也持同样的观点。亚当·斯密把人民富裕之路的探讨上升到了经济体制的层次。1776 年，斯密在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把“国民财富”的提升作为自己研究的历史使命，认为分工和交换，即市场经济，可以“富其君又富其民”，进而惠及人类。19 世纪末年，中国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严复干脆将其译为《原富》，献给清朝的光绪皇帝，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与市场经济的失之交

臂是后来中国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

中国人民，包括中国经济学曾经选择了计划经济。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也是从理论上认为计划经济可以使人民富裕、国家强大。计划经济体制在实践中的低效使得中国人民开始了新的探索，并且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社会对经济理论的认识和发展呈现着一种规律性的现象：经济学家先行一步，在既有认识的基础上选择一个角度提升既有认识，新的认识再经过实践的验证进而被社会认同，写入党的文件，成为全党和全社会的普遍共识。中国经济学在这一过程中一马当先。

市场经济确实能使中国富裕，围绕着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使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代中国凡是经济发达的地区都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然而相对于中国5000年的自然经济、40年的计划经济的“历史遗产”，市场经济毕竟是一个近似于移植的制度安排。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强大的行政力量、利益惯性以及意识形态加大了旨在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难度。对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而言，我们还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职能”，这说明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上升到了新的高度。把这一论断变成现实，当然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需要全面的深化改革。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1）普及市场经济的知识，唤起民众的市场热情，形成浓厚的市场经济的氛围，如同我国市场经济发达地区那样，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创业激情充分迸发。（2）不仅是广大干部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尤其要从根本上把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处理问题的方式转

到市场经济的要求上，即要改变长期计划经济的“习惯”，改变驾轻就熟的老一套。经济学得天独厚，应当着眼于具体的政策、案例，开展润物细无声的工作。

二、敏锐地提出问题，科学地分析问题，在不断的反思中认识经济规律，推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

经济学是研究问题的，经济学研究解决了现实经济生活中必须面对的问题，既促进了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发展了经济学本身。例如，正是对1929年大危机的研究成就了凯恩斯，而后对凯恩斯主义负面效应的研究又诞生了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等。当然，做到这一切的前提是经济学家应当用自己的经济学的先进装备，像探测仪似的敏锐地发现问题，以科学的态度研究问题，而不是像马克思批评庸俗经济学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味地辩护。

经济发展永远都是进行时，每一个时期都有每一个时期必须解决的问题。中国经济学应当发现和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就是如何做强、如何持续发展的问题。我们所以能够迅速做大，是因为曾经存在着做大的条件。而一旦做大，与做大相伴随的条件也就随之消失。经济学家埃德蒙·弗尔普斯在其所著《大繁荣》中深刻指出：“活力轻弱的经济体相对位置的提升，对现代经济实现了部分‘追赶’，其增速将回到正常的全球平均水平，高增速会在接近目标时消退。即使有全球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不意味着某个经济体就具备很高的活力，更不用说高水平的活力。”中国经济已经起飞，起飞后的中国经济必须进行反减速的斗争，在反减速的过程中由大到强。

几乎所有的经济学研究都把做强的举措指向真创新而不是伪创

新，除了人们熟知的熊彼特和库兹涅茨把创新与高质量的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外，埃蒙德·菲尔普斯更是认为 19 世纪 20 年代的英国和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的经济繁荣是广泛的自主创新的结果。是从国民经济中原创的本土创意所发展起来的。经济学家索洛曾经对 1909 ~ 1949 年的美国经济增长进行了计算，结论是 $1/8$ 归因于人均每小时资本的增加， $7/8$ 是技术进步的贡献。继而，经济学的研究同时表明，创新是来自“草根阶层”自觉的创新冲动，来自一系列相应的制度安排。如果能够解决创新的环境和土壤，中国经济学就做出了历史深远的贡献。

环境问题或曰生态文明问题是广大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经济学的研究不仅应当前瞻，而且有必要进行大量的有意义的反思。反思可以纠正经济学曾经存在的认识失误，反思同样可以唤起行政部门对于那些经济学曾经明确指出不合适的东西轻易地加以肯定和追求而产生的消极后果。例如对 GDP 认识的不全面以及不择手段的追求。在一系列的反思中可以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中国是后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所谓后发优势，就是借鉴先期发达国家的经验，吸取他们的教训，使自己更亮丽地展现于世界。从一定意义上讲，当代中国的经济学就是充分发现和挖掘后发优势的经济学，我们完全没有理由把别人被实践证明是不好的东西再重新演绎一遍，例如，我们不应当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当前面对严重的环境问题，应当重新思考我们的发展观，发展的衡量指标以及发展的路径选择。科学的发展观就是满足人们的福祉，人们的福祉里包括美好的环境，污染了环境的 GDP 是背离人民福祉的。

三、脚踏在祖国的大地上，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国的经济学是舶来品，计划经济时几乎照搬了苏联的经济学体系，市场经济下又多以西方经济学为武器。然而，这些理论体系并非中国经济实践的理论概括，因而存在着部分脱节甚至完全脱节的问题，原因在于任何优秀的都是有条件的。中国经济学应当有自己的优秀。中国经济学的优秀首先是思想的优秀，思想的优秀比技术（数理模型）的优秀更重要。

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学可以借鉴，但必须更有必要脚踏在自己的土地上。当年英国蓬勃发展的時候，德国也是后发展国家，德国经济学家没有盲从，系统地提出了适合本国经济实践的经济理论。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针对斯密经济学中只有“世界”和“个人”的观点明确地提出了“国家”对一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提出了适度的贸易保护和梯次开放的经济政策，明确宣布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且他所讲的生产力是近似于现代制度经济学所讲的制度安排。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原西德的经济学界又涌现了弗赖堡学派，提出并在原西德总理艾哈德的领导下实践了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艾哈德们认为，在足球场上，裁判员只能是裁判员，球要交给运动员去踢。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应当保证市场上的充分竞争，其主体是企业，政府的责任是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维护竞争的公平秩序，而不能直接干预经济，更不能越俎代庖。德国今天的经济成就证明了德国经济学的卓越贡献。

13亿人的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提供了经济学研究的肥田沃土。生命之树常绿。中国经济学家只要对这种火热

的经济生活做出独到的、前瞻性的理论概括，就能够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就对世界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这需要深入火热的经济生活。中国经济学应当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像当年马克思那样，借鉴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思想和理论。中国经济还应当是一个改革的经济学，永立潮头的经济学。

原载《人民日报》2014年3月14日

自序 2

更深刻地理解市场经济和中国经济新常态

2008 年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危机爆发以来，笔者发表了大量的研究市场经济、研究宏观经济、研究经济危机、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及经济学本身如何发展的文章，尤其是最近还研究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现在笔者在其中选择了一些文章，以及虽然在此以前发表但却和这些问题紧密相关的几篇文章，一并结集出版。这本文集的总的精神与笔者以往出版的《体制选择分析》、《中国的经济过渡》、《来自市场经济的繁荣》一脉相承，充分论证了只有完善和健全市场经济才能使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才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一、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的经济体制

文集的第一部分集中探讨了有关深化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的问题。

人类经历过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但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市场经济是人类富裕的唯一的康庄大道，是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为什么是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的经济体制呢？

1. 市场经济符合人类本性，各种资源所有者配置资源的目的都在于效用最大，并因此而使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用最大。资源配置是各种资源，如资本、土地、劳动等资源所有者的资源配置，资源的

命运就是资源所有者的命运。以商品生产为例，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只有社会需要该商品的使用价值，该商品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商品生产者才能生存和发展。这样的资源配置才是有效率的资源配置。这是一种规律，这种规律引导着每个资源所有者的行为。在这里，资源的产权明确，即尽可能地人格化，资源的命运就是资源所有者的命运是题中应有之意。并在不知不觉中使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用最大。

2. 各种资源在市场配置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地发挥比较优势。市场配置资源是通过交换进行的，而交换以分工、以专业化为前提。当各个资源所有者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并彼此交换的时候，不仅各自的“蛋糕”可以比原来做得更大，而且整个社会的“蛋糕”也可以做得更大。亚当·斯密正是由此出发论述市场经济是如何富国裕民的。

3. 市场配置资源可以高效地收集和处理信息。经济运行是有成本的，计划经济的低效和市场经济的高效的差异来源于各自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斯密曾经指出：“关于可以把资本用在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上面，其生产物能有最大价值这一问题，每一个人处在当时的位置，显然能判断得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得多。”^① 这里的“每个人处在当时的位置”，既包括他当时所掌握的知识和信息，也包括他的身份，他和资本的关系，即财产所有权问题。多少年以后，同样推崇市场经济的哈耶克更是认为，专家和领导所掌握的知识和信息，并不等同于人们处理和解决问题的全部知识和信息，每个人都掌握着与自己从事的职业相关的，可以利用的信息，只有他适合做出相

^① [英]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第27~28页。

应的决策，并由此而有效地分配资源。市场经济的信息传递是横向的，横向的信息传递相对真实而迅速。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其特有的行政从属关系下，信息的传递是纵向的，纵向传递的信息不仅时滞而且容易失真。

4. 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是竞争状态下的资源配置。具体表现为：第一，当资源所有者将其所拥有的资源，如资本和劳动配置于某个行业或产业时，就存在着事实上的优胜劣汰。在这种情况下，创新和品牌塑造就成了某个企业的自觉行动。有时候盈利的绝对的数量并不重要，相对地领先于别人则更为重要。这个过程就像军备竞赛一样永远不会完结。第二，试图吸引各种生产要素的国家和地区同样处于竞争状态，竞争中的国家必须提供好的人文环境以使资本和人才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而不是补贴。人文和制度环境与吸引资本和人才的关系具有马太效应。

5. 市场经济下资源配置的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的天职使他们会通过创新把资源配置到回报最高，从而效率最高的地方，而地方官员通常会把资源配置到最有政绩的地方。

在当代中国，很多问题都不是市场经济本身产生的，而是不像市场经济的结果。我们欲要发挥市场经济的功能，就必须通过改革，进一步完善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为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市场经济不能“四不像”。

严复曾经说过，牛体不能马用，马体不能牛用，我们欲要获得市场经济体的功能，就必须有健全的市场经济的制度载体。须知，如果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构架不变，那是发挥不出市场经济的功能的。在当代中国，所谓改革，就是要使计划经济之体制转化为市场

经济之体制。如果保留了计划经济体制最核心的东西，这样的体制就会“四不像”。“四不像”的体制试图结合二者的优点，其结果可能恰恰是结合了二者的缺点。事实上，由于中国历史上是自然经济，又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加之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基于“路径依赖”的原理，我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反倒更多的应当担心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像不像市场经济的问题，即市场经济的共同性。从逻辑上讲，首先是让它先是“马”，然后再是“红马”还是“黑马”的问题。各国的市场经济都有其特殊性，例如美国的市场经济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法国的市场经济多少有点计划指导的色彩，日本则是社团式的市场经济，德国人又把他们的市场经济叫做社会市场经济，即用市场去解决效率问题，用政府调控解决公平竞争和社会公正的问题，政府不直接干预微观主体的活动。中国人民一定会通过自己的改革寻找到市场经济的共同性和特殊性的最佳结合。

第二，转变人们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思维习惯，使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

美国学者查尔斯·都希格在其所著《习惯的力量》中指出，我们每天作出的大部分选择似乎都是精心考虑的决策结果，其实不然，这些选择都是习惯的结果。按照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革理论，即使正规制度发生了变化，非正规制度也会“时滞”，而如果作为非正规制度的一系列内容，其中包括习惯，如果不发生相应的变化，就会与已经变化了的正规制度发生“摩擦”，就会加大正规制度的运行成本。

习惯是长期如此的结果，长期的自然经济，以及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使我们特别是各级干部养成了与之相适应的习惯，其集中

体现在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地方政府更是热衷于行政手段，用自己制定的优惠政策、用行政手段、直接上项目推动经济发展。他们所习惯的、所热衷的，恰恰是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是与市场经济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背道而驰的。

第三，欲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变政府职能是重中之重。

计划经济高度集权，整个社会就像一个大工场，每个企业都是大工场的车间，从本质上拒绝商品货币关系，人民群众没有选择的空间和自由。社会由严格的层级构成，政府用行政手段指挥一切。由于人类本性与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存在巨大差异，也由于信息收集方面的困难，以及传递过程中的失真和时滞，致使计划经济体制严重低效。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改革，并且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完全不同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是通过产权明确的微观主体之间的交易进行的，整个交易的过程在市场价格信号的诱导下自觉遵循经济规律。市场经济最容易遵循经济规律，原因在于作为分散的个体谁也不能左右市场走势，只能按照市场价格反映的趋势行动。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发展，是微观层面的经济发展。基于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市场经济体制对政府的要求完全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基本功能是保证市场的高效、稳定运行，这就把政府的功能严格限制在提供公共服务、制定游戏规则、监督执行规则的基本层面。对于市场经济下政府的职能，亚当·斯密有着非常经典的论述。他认为，政府的功能首先是提供公共安全，斯密说：“君主的义务，首先在于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

会的暴行与侵略。”其次是法律秩序。斯密说：“君主的第二个义务为，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辱或压迫，换言之，就是设定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最后是其他公共产品。斯密说：“君主或国家的第三个义务就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这类机关和工程，对于一个大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就其性质来说，设由个人或少数人办理，那所得的利润绝不能偿其所费。所以这种事业，不能期望个人或少数人出来创办维持。”^①斯密关于市场经济下政府职能的经典论述，即使今天看来也不过时。

从计划经济体制继承下来的政府职能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那种超越市场经济下政府职能的边界的行为，严重破坏了市场效率，政府必须转变职能，使之成为市场经济下的高效政府。然而，这种改革很难期待政府相关部门的自觉，因为这是一种利益的调整。

二、中国经济步入了“新常态”，要认识新常态，理解新常态，适应新常态

文集的第二部分探讨了中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新常态”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

2013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笔者《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文章。2014年6月20日，笔者又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论文。的确，中国经济步入了“新常态”，我们应当正确地认识新常态、理解新常态、适应新常态。

“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步入了一个稳健的追求经济增长速

^① [英]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84页。

度、质量和效益统一的发展时期。一般来说，一个追赶型国家在追赶过程中通常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快速发展时期。这个阶段所以能快速发展，是因为发展之初产业空间大，沿着先期发展国家的产业轨迹，模仿着前进就可以做大。同时由于资源环境压力不大，基数不大，增长速度会比较快。随着上述条件的不复存在，通常会进入第二个阶段，其显著特点是经济增长速度会慢下来，但更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一个稳健的增长期。第三个阶段是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经济增长速度不仅会慢下来，而且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会趋同。

进入“新常态”是一种进步。以往单兵独进、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快速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一系列剧烈的摇摆和失衡，包括内需和外需的失衡，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的失衡，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失衡。高投入、高消耗、高速度、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方式使我们面临着严重的资源环境压力、社会压力。步入“新常态”后必须解决上述一系列的失衡。解决的途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新的增长方式的特点是创新、内需、环保，主要由市场驱动。我们现在必须寻找新的增长点，新的增长点绝不是简单地靠房地产推动经济发展的问题，而是货真价实的实体经济的创新。熊彼特和库兹涅茨都把创新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一个巨大的创新造就了一批产业，产生了一批企业和企业家，促进了经济较长周期的发展。

创新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结果，而不是号召的结果。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菲尔普斯认为，社会的活力是十分重要的，态度和信仰是经济活力的源泉。保护激发个性、想象力、理解力、进而自我实现的文化十分重要。当然，创新者的权利必须得到足够的保障。